

17—18 世纪法国天主教 与易洛魁人萨满教的碰撞研究^{*1}

乔国存

内容提要 17—18 世纪,在耶稣会向易洛魁联盟五部落传播基督教、对“归化村”的易洛魁人进行系统地宗教转化的过程中,基督教与易洛魁人的萨满教发生了碰撞。受法国殖民者与易洛魁人政治关系的影响,基督教在五部落中的传播时断时续,易洛魁人的酋长、族人和萨满对传教士和基督教产生不同的回应。在耶稣会和印第安人传统政治势力的影响下,归化村中的基督教和萨满教相互妥协,产生了兼具基督教和萨满教元素的“公开忏悔”仪式。

关键词 殖民时期 天主教 易洛魁人 萨满教

一、历史背景和相关研究

(一) 法国殖民者、耶稣会传教士和易洛魁人之间的关系格局

在与欧洲人遭遇以前,易洛魁联盟的五部落莫霍克人(Mohawk)、塞尼卡人(Seneca)、奥内达人(Oneida)、奥内达加人(Onondaga)和卡尤加人(Cayuga),居住在今天纽约中心的哈德逊河以西、圣劳伦斯河到安大略湖以南的芬格湖区域。^① 根据史料,迟至 1570 年^②,为了结束“血亲复仇”和“默哀战争”^③导致的部落混战,易洛魁人五部落依据“和平大法律”^④,建立联盟。联盟自成立后,开始向周围部落传递“和平信息”。由于易洛魁人经常诉诸武力追求其所谓的“伟大和平”^⑤,他们在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新萨满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1XZJ024)的阶段性成果。

① Robert A. Williams, “Linking Arms Together: Multicultural Constitutionalism in a North American Indigenous Vision of Law and Peace”,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82, no. 4, 1994, pp. 998

② 关于易洛魁联盟成立的时间,目前尚未达成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成立于 1142 年,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联盟形成于 1450 年,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roquois#Formation_of_the_League; 还有学者则认为联盟形成于 1570 年,参见 William Brandon, Alvin M. Josephy, (eds.), *American Heritage Book of Indians*, American Heritage Pub. Co, 1961, p. 187.

③ “血亲复仇”是在氏族和部落组社会时期,一旦有氏族成员被其他氏族的人杀害,在双方达不成和解的情况下,被害者所在氏族指派一个或多个报仇者,追踪杀人犯,将其就地杀死的报仇行为和习俗,在氏族社会中,血亲复仇是每个氏族成员的义务。参见[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58 页。“默哀战争”是基于血亲复仇的义务以及由于战争等原因导致部落人口大规模减少时,针对对敌部落发动大规模和远距离的战争,是从敌部落获得大量战俘进行收养或者仪式性地将其折磨至死的战争行为和文化习俗。参见 Jon Parmenter, “After the Mourning Wars: The Iroquois as Allies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n Campaigns, 1676 - 1760”,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64, no. 1, (Jan., 2007), p. 39.

④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Law_of_Peace

⑤ 为了实现普遍的和平,易洛魁人对联盟外印第安人实施下列举措:第一,向其他部落传递和平信息,希望这些部落加入易洛魁联盟,成为第六、第七个联盟部落或五部落的子部落。第二,在其他部落不同意加入联盟的情况下,与易洛魁联盟签订和平条约,实现平等联盟。第三,在既不赞同加入易洛魁联盟也不愿实现和平联盟的情况下,易洛魁联盟发动默哀战争,直到他们接受“和平大法律”。参见 Horatio Hale, *The Iroquois Book of Rites*, 1883, pp. 89 - 95, <http://www.sacred-texts.com/nam/iro/ibr/ibr05.htm>.

他印第安人和欧洲人中留下好战的形象。法国殖民者从1608年在魁北克建立第一个殖民点开始,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联合休伦人和阿尔贡金语系的印第安人,将与这些印第安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易洛魁人视为贸易障碍,从第一次接触开始就向易洛魁人发动频繁的攻击。^①1622年,法国殖民者更是制定一项政策,不允许法国利益范围圈内的任何印第安人族群和易洛魁人单独签订协定,他们之间的任何协商必须有法国代表在场,并且由法国政府参与计划和实施。^②通过这一政策,法国殖民者将易洛魁人与同法国结盟的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变成法国人与易洛魁人之间的问题。

耶稣会(Jesuit),作为独立于法国殖民者的传教团体,1625年受方济会(Franciscan)的邀请,进入圣劳伦斯河一带传教。1632年,法国红衣主教将在美洲殖民地的宗教事务交由耶稣会负责。此后,耶稣会成为法国在美洲的主要传教力量。^③詹姆士·P·伦达(James P. Ronda)认为,在17世纪50年代以前,耶稣会还是协助法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进行“法国化”的唯一的、“先导性”的力量。^④

受法国人与易洛魁人关系的影响,17世纪法国殖民者、耶稣会传教士和易洛魁人的互动过程是这样的:17世纪初到17世纪40年代,易洛魁人就其与休伦人和阿尔贡金语系的印第安人建立和平联盟、或者在易洛魁人地域建立贸易站的问题,派代表与法国人协商,结果遭到拒绝或因法国提出无理要求而失败,易洛魁人遂发动武力袭击,易洛魁人与休伦人签订和平条约,但终因瘟疫的爆发而废止。^⑤17世纪50到60年代,易洛魁人打败休伦人,收养战俘,与法国签订和平条约,允许传教士进入并传教。随着瘟疫的爆发,传教士遭到驱逐,易洛魁人向新法兰西发动攻击,法国人还击,易洛魁人战败并签订和平条约。^⑥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初,因法国人挑唆易洛魁人与休伦人和渥太华人的和平联盟关系,易洛魁人与其交恶,传教士遭到驱逐。^⑦随后,法国正规军俘获易洛魁50位酋长,引发大规模战争,^⑧易洛魁人采取中立政策,同时与英国和法国签订和平条约。^⑨

在易洛魁人与法国人的这种关系格局中,耶稣会于17世纪50到60年代,在纽约芬格湖地区的易洛魁人五部落中间建立传教站,并尝试对易洛魁人开展传教活动。^⑩根据传教士们的统计数

① 法国在1609、1610、1615年参与到休伦人等与易洛魁人之间的战争,并且对易洛魁人发动不计其数的袭击。参见 Daniel K. Richter, “War and Culture: The Iroquois Experience”,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40, no. 4, 1983, p. 540.

② Karl H. Schlesier, “Epidemics and Indian Middlemen: Rethinking the Wars of the Iroquois, 1609 – 1653”, *Ethnohistory*, vol. 23, no. 2, 1976, pp. 135 – 136.

③ James P. Ronda, “The European Indian: Jesuit Civilization Planning in New France”, *Church History*, vol. 41, no. 3, 1972, p. 386; Daniel Thechenberger, “The Jesuits: History and Impact: From Their Origins Prior to the Baroque Crisis to Their Role in the Illinois Country”, *Journal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00, no. 2, 2007, p. 88.

④ James P. Ronda, “The European Indian: Jesuit Civilization Planning in New France”, p. 386.

⑤ Karl H. Schlesier, “Epidemics and Indian Middlemen: Rethinking the Wars of the Iroquois, 1609 – 1653”, p. 135, 136, 138 – 141.

⑥ 参见梁立佳:《北美易洛魁人与白人文明关系的变迁(1609—1815)》, 博士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14年, 第61页; Karl H. Schlesier, “Epidemics and Indian Middlemen: Rethinking the Wars of the Iroquois, 1609 – 1653”, p. 143; Daniel K. Richter, “Iroquois versus Iroquois: Jesuit Miss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Village Politics, 1642 – 1686”, *Ethnohistory*, vol. 32, no. 1, 1985, p. 3; Anthony F. C. Wallace, “origins of iroquois neutrality: the grand settlement of 1701”, *Pennsylvania History: A Journal of Mid-Atlantic Studies*, vol. 24, no. 3, 1957, p. 225.

⑦ Anthony F. C. Wallace, “Origins of Iroquois Neutrality: The Grand Settlement of 1701”, p. 225; Daniel K. Richter, “Iroquois Versus Iroquois: Jesuit Miss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Village Politics, 1642 – 1686”, *Ethnohistory*, vol. 32, no. 1, 1985, p. 11.

⑧ 1687年法国军队俘获易洛魁50位参加篝火会议的酋长进而引发易洛魁人疯狂报复的相关内容,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aver_Wars#Resumption_of_war_with_France, 阅读时间2017年1月16日。

⑨ 1701年易洛魁人与法国人签订和平条约的相关内容,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aver_Wars#Great_Peace_of_Montreal, 阅读时间2017年1月16日。

⑩ Daniel Thechenberger, “The Jesuits: History and Impact: From Their Origins Prior to the Baroque Crisis to Their Role in the Illinois Country”, p. 89.

据,截至 1679 年,大约有 8600 个易洛魁人皈依为虔诚的基督徒。其中,奥内达人、奥内达加人和塞内卡人中有 20% 的基督教信徒,在卡尤加人中则不足 20%,在莫霍克人中超过 20% 的居民皈依了基督教。^① 17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法国人和易洛魁人关系的交恶,耶稣会在易洛魁人中的传教被迫终止。

耶稣会传教士在易洛魁人五部落中的传教活动不仅受到法国殖民者与易洛魁人之间政治关系的影响,也受到易洛魁人中坚持传统信仰者的不断阻挠。与此同时,17 世纪 40 年代以来,耶稣会在“法国化”印第安人方面与殖民当局产生分歧,自 1659 年开始抵制白酒商人,从 17 世纪 70 年代起拒绝执行殖民当局的指令,导致耶稣会在殖民地的影响力下降。^② 为了摆脱易洛魁人传统势力的束缚,阻断法国商人不良风气的影响,促成大批易洛魁人皈依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从 16 世纪 60 年代开始鼓动易洛魁基督徒移居到传教村落苏圣路易斯(Sault Saint Louis,即 Caughnawaga 或 Kahnawake)和罗瑞德(Lorette)。^③ 在耶稣会的鼓动之下,17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的这波移民潮在 1673 年后达到一个高潮,到 1679 年时,有 2/3 的莫霍克人迁到归化村卡纳威克。^④ 他们被法国人和英国人称为“祈祷的印第安人”(Praying Indians),而莫霍克人自称为“胸前划十字架的真正的人”(ongwe honwe tehatiisontha)。^⑤

17 世纪法国天主教与易洛魁人萨满教之间的互动发生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和宗教背景中,本文意在通过探讨在五部落和卡纳威克村中基督教与萨满教的具体碰撞案例,考察殖民背景下基督教对印第安人的影响以及印第安人对基督教和殖民者做出的回应问题。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殖民时期法国天主教与易洛魁人的萨满教发生碰撞的相关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在我国学者中,对这一问题探讨最多的是梁立佳及其导师董小川。在 2009 年发表的《基督教在北美殖民地早期易洛魁部落联盟传播问题初探》一文中,梁立佳从接触、接受和发展、衰落三个阶段探讨了 17 世纪 40—70 年代基督教在易洛魁联盟中的传播情况,并指出由于吸纳移民、军事胜利、和平和社会改变的需要以及上层人物自身的考虑,基督教在易洛魁人地区得以传播。由于法国势力的衰退、易洛魁人中传统文化势力的阻挠和耶稣会传教方式的失误,基督教在易洛魁人中的传播以失败告终。^⑥ 在随后 2014 年的博士论文《北美易洛魁人与白人文明关系的变迁(1609—1815)》中,梁立佳指出,17 世纪 50 年代以来易洛魁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是促进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易洛魁人中出现多元文化以及 18 世纪易洛魁人采取“中立政策”的重要原因。^⑦

2013 年,梁立佳以易洛魁人与北美殖民者之间的文化接触为例,梳理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北美学术界关于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接触的研究动态。梁立佳将 20 世纪 30 年代和 60 年代作为两个分水岭分析了学者们对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文化接触的研究,30 年代以前学者们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强调白人文化的优越性并相信印第安人文化必将灭亡,30 年代以后尽管出现了以博厄斯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相对主义论,但易洛魁人与白人之间的文化接触问题并未受到重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和新文化史学蓬勃发展,学者们才开始从文化适应角度看待

① Daniel K. Richter, “Iroquois versus Iroquois: Jesuit Miss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Village Politics, 1642 – 1686”, p. 8.

② James P. Ronda, “The European Indian: Jesuit Civilization Planning in New France”, pp. 393 – 395.

③ David Blanchard,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ky: Catholicism at Kahnawake, 1667 – 1700”, *Anthropologica*, New Series, vol. 24, no. 1, 1982, p. 90, 95.

④ Daniel K. Richter, “Iroquois Versus Iroquois: Jesuit Miss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Village Politics, 1642 – 1686”, p. 11.

⑤ David Blanchard,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ky: Catholicism at Kahnawake, 1667 – 1700”, p. 90.

⑥ 梁立佳:《基督教在北美殖民地早期易洛魁部落联盟传播问题初探》,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⑦ 梁立佳:《北美易洛魁人与白人文明关系的变迁(1609—1815)》,博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4 年,第 61—62 页。

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文化接触,印第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关注,以往被忽视的殖民地地下层民众的认识和感受得到重视。^①梁立佳与董小川关于北美印第安人(尤其是易洛魁人)的宗教以及殖民时期白人和印第安人文明接触的研究,为本文探讨殖民时期天主教与印第安人萨满教之间的碰撞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脉络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梁立佳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后北美学者对易洛魁人与白人文化接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方面。^②在对易洛魁人与白人之间文化接触的研究中,从互动的角度对宗教碰撞进行的研究及成果相对较少。不过,国外仍然有学者从耶稣会在易洛魁人中的传教、基督教传播对易洛魁人产生的影响以及易洛魁人中新的宗教形式等方面对天主教与易洛魁人的萨满教的碰撞问题进行探讨。1982年,大卫·布兰查德(David Blanchard)探讨了在1667—1700年间“祈祷小镇”卡纳威克中易洛魁人和休伦人基督徒的“公开忏悔”仪式的性质问题。布兰查德认为,“公开忏悔”仪式是易洛魁人和休伦人将基督教忏悔仪式和易洛魁人的萨满教入术术相结合的宗教形式,其实是基督教形式下的萨满教,在其形成过程中,耶稣会传教士稀里糊涂地起到了助推的作用。^③1985年,丹尼尔·K·理查特(Daniel K. Richter)从基督教传播对易洛魁人村落政治产生影响的角度,探讨了从1642年易洛魁人遇到第一位传教士到1686年耶稣会被驱逐期间,耶稣会在易洛魁五部落中的传教经历、取得的成果以及基督教的传播对易洛魁部落造成的影响——派系分裂。^④

1992年,约翰·斯特克利(John Steckley)探讨了耶稣会传教士在休伦人中传教时借用经常向休伦人发动战争的易洛魁人的文化,与之对话并将其运用在向休伦人中传播基督教的现象。传教士通过将易洛魁人关于战争之神、折磨、收养和母系家庭等的相关传说和知识,与基督教的上帝、地狱之苦相关联,并将洗礼作为建立休伦人与神父的虚拟亲属关系的仪式,将神父作为基督教家庭创始人等,向休伦人传播上帝、天堂、地狱等的知识,并试图将休伦人的母系氏族体系转化为西方的父权体制。^⑤1992年,阿曼达·波特菲尔德(Amanda Porterfield)为我们展现了在基督教元素被引入印第安人的宗教和生活中之后,易洛魁人对其进行内化并用它来阐释和应对西方殖民带给他们的体验的案例。波特菲尔德指出,阿尔贡金人和易洛魁人的巫术信仰来源于基督教关于恶魔和巫术的观点。在17—18世纪,这两个群体中发展出四种类型的巫术信仰,分别是将基督教传教士和牧师当作巫师;宣称自己拥有可以操纵恶灵的力量;承认所有的印第安人仪式都是邪恶的;承认特定的萨满是巫师。其中前两种类型的巫术信仰是对殖民的敌对回应,而后两种则是基督教意识殖民的后果。^⑥

1999年,威廉姆B·哈特(William B. Hart)探讨了在向休伦人和易洛魁人传教时,耶稣会引入圣母玛利亚以及休伦人和易洛魁人对此作出的回应问题。哈特指出,17—18世纪,耶稣会在传教活动中将圣母玛利亚塑造成仁慈的母亲、贞洁的代表和蒙特利尔等地的保护神等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在印第安人中组建各种家庭联谊会 and 贞女协会。因为易洛魁人中同样有“天女之女”的信仰,有与天主教联谊会(Catholic confraternities)相似的萨满教协会,加之传教士赋予圣协会成员无上的荣

①② 梁立佳:《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学界有关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接触历史的研究动态——以北美殖民地时代易洛魁亚地区为例》,载《世界民族》,2013年第6期。

③ David Blanchard,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ky: Catholicism at Kahnawake, 1667 - 1700”, p. 96, 97, 98.

④ Daniel K. Richter, “Iroquois Versus Iroquois: Jesuit Miss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Village Politics, 1642 - 1686”, pp. 1 - 16.

⑤ John Steckley, “The Warrior and the Lineage: Jesuit Use of Iroquoian Images to Communicate Christianity”, *Ethnohistory*, vol. 39, no. 4, 1992, pp. 478 - 509.

⑥ Amanda Porterfield, “Witchcraft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Algonquian and Iroquois Cultures”,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vol. 2, no. 1, 1992, p. 104, 120, 121.

誉感,导致大批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并且出现很多极端的“英雄行为”。^①

以上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7—18世纪易洛魁人与耶稣会的宗教关系中,基督教在五部落的传播不仅导致一部分易洛魁人的宗教信仰发生变化,而且也因为宗教立场的差异导致不同的政治立场,从而引发了易洛魁人内部的分裂。这是耶稣会传教士之所以被邀请进入易洛魁人中传教和最终被驱逐的重要原因。同时,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来自基督教的一些观点会对传统萨满教产生一定的冲击。耶稣会运用基督教和易洛魁人共有或相似的宗教元素向易洛魁人传播基督教,而易洛魁人在接受这些信息时将其赋予了萨满教的含义。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从宗教互动的角度反观不同政治背景中易洛魁人与传教士和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能使我们对殖民史有不同的理解。

二、易洛魁五部落与耶稣会交往中的宗教碰撞

丹尼尔·K·理查特在探讨1642—1686年耶稣会在五部落的基督教传播时指出,易洛魁人中的不同群体对基督教和传教士态度不同:易洛魁首领更多的是从外交和政治的角度回应耶稣会传教士和基督教;大部分易洛魁人从传统萨满教的角度回应传教士。理查特没有过多地提及萨满,只是将他们视为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的竞争对手,指出萨满在战时会从基督教的“十字架”中寻求力量。^②但是从阿曼达·波特菲尔德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对易洛魁人的传统萨满教和萨满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萨满在不同时期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一) 易洛魁人首领与传教士的往来

根据丹尼尔·K·理查特的观点,17世纪,易洛魁人首领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和往来通常会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为了安抚休伦基督徒战俘,允许传教士进入易洛魁人部落。第二,与法国人进行协商和签订条约时,作为交换“人质”的需要,将传教士带回易洛魁人部落。第三,易洛魁人头领通过与传教士的频繁交往,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礼物,再将礼物发放给族人从而获得威望。第四,当与别的部落发生战争、处于不利地位时向传教士和基督教寻求更强大的宗教力量。为此,理查特总结道:“易洛魁人首领对待耶稣会的最初反应,是基于传教士能否为他们带来物质的、威望的、宗教上的利益的考虑。但凡传教士能够带来这些利益,易洛魁人头领便会与其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③

尽管大多数易洛魁人首领并没有对基督教产生较强的兴趣,但是确实有一些部落的首领转化成了在传教士看来是虔诚的基督徒,例如奥内达加部落的首长伽拉康帖(Garakontié)和莫霍克部落的头人阿森达瑟(Assendasse)。他们虔诚皈依基督教,直接导致其血亲成员和氏族成员都转化成为基督徒。皈依后的伽拉康帖通过拒绝参加传统节日,也禁止其部落成员参加传统节日,并谴责传统萨满教的治疗和饕餮盛宴(eat-all feast)等行为,成为传统萨满教的反对者。^④理查特指出,在与易洛魁人首领交往的过程中,大多数传教士自己都承认,“对于易洛魁人首领而言,传教士兼具宗教和外交角色,易洛魁人首领更看重他们的外交角色。”因而,在17世纪70年代以后,传教士宣称,“要为耶稣基督争取大量的印第安人酋长。”^⑤在易洛魁人与法国人关系总体不甚融洽的情形下,正是易洛魁人首领从政治和外交角度对传教士的需求使耶稣会传教士有机会对易洛魁人进行基督教传播。

(二) 易洛魁人萨满教视野中的基督教和传教士

丹尼尔·K·理查特指出,当易洛魁人首领从政治和外交视角看待耶稣会传教士和基督教时,

① William B. Hart, “The Kindness of the Blessed Virgin: Faith, Succor, and the Cult of Mary among Christian Hurons and Iroquoi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France In Nicholas Griffiths and Fernando Cervantes”, in Nicholas Griffiths and Fernando Cervantes, *Spiritual Encounter: Interaction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Native Religious in Colonial America*,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Press, 1999, pp. 65–91.

② ③ ④ ⑤ Daniel K. Richter, “Iroquois Versus Iroquois: Jesuit Miss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Village Politics, 1642–1686”, pp 4–6, 3–4, 9–10, 4–5.

绝大部分易洛魁人则从宗教的角度对基督教传教士做出回应。易洛魁人与传教士之间一系列的接触迹象表明,易洛魁人将传教士当成了白人萨满。1642年,传教士乔格斯(Jogues)在易洛魁人与法国人关系并不融洽之时被抓获,他被收养并且在莫霍克人中负责照看病人和举行天主教仪式,扮演着萨满的部分角色。当虫灾爆发时,莫霍克人认为是乔格斯先前留在部落中的物品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因而他在离开又返回后被当作巫师处死。每当瘟疫来临时,传教士往往被当作罪魁祸首,遭到驱逐或者被杀害。传教士对医药和气象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使易洛魁人对其拥有的强大的超自然力量感到惊叹和折服,进而吸引到大批追随者;当与其他印第安人发生战争并且处于不利地位时,易洛魁人首领及部落萨满从传教士及基督教象征物(例如十字架)中寻求更强大的力量。^①

根据丹尼尔·K·理查特的研究,易洛魁人中的萨满,是拥有和能够操纵超自然力量的人。通常,萨满通过将其能力用于治病、促进粮食生长和捕猎成功等有利于个人和群体的活动中,提高自己的宗教力量,并增进所在部落的福祉。然而,萨满也可以将其能力用在破坏性的方面,诸如引发瘟疫、使农作物枯萎和取走猎物,在这种情况下,萨满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宗教人物变成令人厌恶的巫师。^② 理查特对萨满的界定解释了易洛魁人何以将传教士与瘟疫关联起来,又为何因为传教士掌握的医药和气象知识而成为传教士的追随者,在战争中向传教士寻求更强大的力量。将乔格斯的随身物品当作灾害的来源、将“十字架”作为“护身符”的现象,则是基于易洛魁人萨满教的逻辑:在易洛魁人的萨满教中,不仅认为人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拥有与生俱来、能够表现其自身特性的力量。两种事物通过特定的接触可以传递这种力量,萨满就是可以获得并能操纵这些力量的人。^③ 因此,在易洛魁人看来,传教士随身携带的基督教象征物、甚至有时候与传教士相关的任何物品都具有宗教属性。^④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迈克尔·威尔顿(Michael Welton)指出的,在易洛魁人看来,萨满及其拥有的力量都是中性的、不稳定的和变动的。^⑤ 因此,当易洛魁人认为传教士的超自然力能为他们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祉时,他们追随传教士成为“基督徒”,当这种超自然力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时,或者有时候被视为导致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源头时,他们随即转向传统萨满教。

(三) 易洛魁人萨满对基督教的回应

在易洛魁人的传统社会中,萨满除了通过操纵超自然力为部落成员带来福利,也通过与威胁部落秩序的毁坏性力量的不断对抗,担任着维护部落平稳发展的“宗教安全卫士”。^⑥ 在与耶稣会传教士交锋的过程中,易洛魁首领因传教士对医药、天文和气象等方面知识的掌握,对其不时加以青睐。易洛魁人中基督徒势力的出现,使萨满处于被动的地位,并且丧失了很多信众。

不仅如此,基督教在传入美洲后从神学基础上对萨满及萨满教发起了挑战,传教士将基督教的上帝/恶魔(God/Devil)的观念及其影响下的善/恶二分法引入了美洲。在这种宗教观的影响,传教士将印第安人中拥有超自然能力的人分成两个阵营:萨满、占卦者和算命先生被归入善的阵营,术士(sorcerers)和女巫(witches)则被归入恶的阵营。^⑦ 为了同萨满竞争宗教影响力、争取更多的信

①② Daniel K. Richter, "Iroquois Versus Iroquois: Jesuit Miss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Village Politics, 1642 - 1686", *Ethnohistory*, vol. 32, no. 1, 1985, pp. 5 - 7, 5.

③ David Blanchard, "Who or What's a Witch? Iroquois Persons of Power",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6, no. 3, 1982, pp. 218 - 225.

④ Robert Conkling, "Legitimacy and Conversion in Social Change: The Case of French Missionaries and the Northeastern Algonkian", *Ethnohistory*, vol. 21, no. 1, 1974, p. 13.

⑤⑥ Michael Welton, "Cunning Pedagogics: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and Amerindians in 17th-century New France",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pp. 103 - 104. 详见:tp://aeq.sagepub.com/content/55/2/101

⑦ David Blanchard, "Who or What's a Witch? Iroquois Persons of Power", p. 224.

徒,传教士常常将印第安人的萨满看成是魔鬼、恶魔、巫师和女巫。^① 根据基督教的观念,巫师和女巫是恶魔的代言人,是与基督教道德标准相违背的一方。基督教对印第安人萨满神职人员的划分和诋毁使萨满站到了基督教道德观念的对立面。

这种做法在易洛魁人中产生三种反响:第一,一些皈依基督教的易洛魁人接受了欧洲人的观念,将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看作是对恶魔的崇拜。^② 在为数不多的皈依为虔诚基督徒的易洛魁人中,奥内达加氏族酋长伽拉康帖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对传统萨满的治疗仪式和饕餮盛宴予以谴责,并对传统神话进行了诋毁和攻击。^③ 第二,易洛魁人开始将萨满当作巫师,出现了将疾病、社会和文化混乱归咎于萨满的倾向。^④ 第三,传教士指责易洛魁人的萨满,易洛魁人的萨满也将传教士看作是巫师,将上帝视为恶魔,将诸如疾病带来的人口锐减以及殖民和传教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动荡和变迁,归结为传教士和基督徒利用基督教巫术进行的破坏。^⑤

易洛魁人对基督教攻击和指责萨满做出的反应表明,基督教关于恶魔的观念确实对易洛魁人的萨满教信仰产生影响,一些易洛魁人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并用“恶魔—萨满—巫术”的基督教观念解释易洛魁人遭遇的不幸。易洛魁人萨满发现,除了那些可以利用基督教的摧毁性力量的白人萨满(传教士)外,那些带给易洛魁人疾病、新的观点和科技的白人,似乎同样可以利用基督教巫术,这些白人又都是基督徒。所以,萨满中普遍流行一种观点,即基督教是基督徒和邪恶神灵进行交流的方式,在白人当中,不仅传教士可以和基督教中的邪恶神灵进行交流,那些基督徒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出于争取信徒和维护萨满教的需要,萨满将易洛魁人遭受的所有不幸的根源指向基督教巫术和基督徒,认为掌握与基督教邪恶神灵进行沟通之巫术的基督徒和传教士才是造成易洛魁人不幸的根源所在。^⑥ 阿曼达·波特菲尔德指出,易洛魁人将基督教看作巫术,将上帝当作恶魔,将传教士当作巫师,往往是在易洛魁萨满用传统的方式对抗基督教和传教士失败之后,借用基督教元素反思基督教乃至殖民带给印第安人的影响的结果。笔者认为,萨满将基督教当作巫术,不仅是出于萨满对基督教的敌视,更是其对基督教所代表的殖民主义进行的反思和回应。

萨满的这种具有“反基督教”和“反殖民主义”色彩的宗教回应,在17世纪70年代末表现得最为突出。基督教的传播使易洛魁人内部分裂并发生冲突,大批易洛魁基督徒搬离,易洛魁人与法国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传统萨满将耶稣会和基督教视为导致易洛魁部落人口减少、文化和社会发生动荡的根源,导致在17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时,所有的耶稣会传教士被驱赶出五部落。^⑦

三、卡纳威克村“公开忏悔”仪式及对“罪恶”观的反思

如果基督教与萨满教在五部落范围内的碰撞是基督教接触萨满教并试图争取印第安人基督徒的过程,那么在卡纳威克村基督教与萨满教碰撞则是耶稣会对印第安人的系统的、精心的基督化过程。根据大卫·布兰查德的说法,由于卡纳威克还在莫霍克人的领地范围内,因而村子中的大小事情仍然按照“和平大法律”的规定由传统的易洛魁人议会做出决定,但是出于尊重耶稣会传教士的需要,双方在宗教形式问题上会做出让步。例如,耶稣会传教士默允莫霍克人庆祝传统节日,并将一部分节日与基督教的庆典相结合,与印第安人一同庆祝。传教士坚决反对莫霍克人传统的做梦仪式(入迷术),莫霍克人对此也做出“让步”,借鉴基督教的忏悔仪式,发展出“公开忏悔”

① James P. Ronda, “‘We Are Well As We Are’: An Indian Critique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ristian Mission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34, no. 1, 1977, p. 75.

②④⑤⑥ Amanda Porterfield, “Witchcraft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Algonquian and Iroquois Cultures”,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vol. 2, no. 1, 1992, p. 110, 103, 109, 110.

③⑦ Daniel K. Richter, “Iroquois Versus Iroquois: Jesuit Miss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Village Politics, 1642–1686”, p. 10, 11.

(hotoungannandi) 仪式。^①

从1676年开始,在卡纳威克出现一种以基督教禁欲行为为特点的“公开忏悔”仪式。印第安人从修女和耶稣会修道士那里学习到通过折磨自己为自己的过失“认错”(culpa)的做法,模仿并发展出比传教士和修女更严厉的“认错”方法。例如,他们裸体曝露在寒风和大雪中瑟瑟发抖,将自己沉浸在冰窟里颂念念珠串,将自己抽打的浑身是血,自毁形象,对身体做出种种伤害使身体达到所能承受极限的上限等等。通过这些行为,他们宣称在为自己、亲人、邻居甚至整个世界的过失赎罪。在17—18世纪的传教士的大量记载中,传教士对此尽管偶尔也表现一些疑虑,但都将这些行为看作是虔诚的基督教忏悔行为。^②

大卫·布兰查德通过考察萨满教入迷术形成的条件,并对“hotoungannandi”一词的易洛魁语义进行了考据,认为17—18世纪在卡纳威克易洛魁人和休伦人的这种“公开忏悔”仪式实际上是萨满教的入迷仪式。因为,“hotoungannandi”一词的易洛魁语的意思就是“他们正在做法事”(They are making magic),印第安人引用并发展出来的这些行为,看似是基督教行为的禁欲和苦修,实际上是将其发展到足以刺激并改变自己的意识状态的程度,进而进入到一种入迷状态,从而实现与易洛魁人传统的“天的另一边”的沟通和交流。传教士不仅默许这种仪式,还稀里糊涂地帮助印第安人完成入迷仪式,并且允许这种仪式的传播,以至于到18世纪时,莫霍克人将这种仪式传播到易洛魁人的各个部落。^③除了仪式本身,事实上,印第安人在“公开忏悔”仪式中体现出的“罪恶观”似乎也与基督教理解的“罪恶”和“赎罪”观念并不一致。在进行“公开忏悔”的仪式中,人们将自己曝露在寒风和大雪中,那些将自己浸泡在冰窟中的女性们认为是在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赎罪。^④“莫霍克人中的百合花”,圣女凯特丽(Kateri Tekakwitha)认为她对自己的各种折磨是在为世界上所有的罪恶赎罪。^⑤还有一些母亲,不仅自我折磨,还让孩子与自己一起“公开忏悔”,认为她们是在教育孩子最好的季节进行忏悔,或者让孩子为还未犯下的罪恶赎罪。^⑥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印第安人所谓的“罪恶”,与基督教中因为原罪或违反上帝及上帝的律法而形成的罪恶并无关系,更倾向于是对越轨行为(transgressions)的悔罪。同时,基督教所谓的赎罪,是指个人通过向上帝忏悔,遵守基督教的各种教规求得与上帝的和解。^⑦而易洛魁人认为通过“公开忏悔”,不仅能为自己,还能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和世间万事万物赎罪,这种观念与基督教的“罪恶”和“赎罪”的观念相差甚远。无怪乎哈特指出,印第安人在为他人和整个世界赎罪时,罪恶已经不复存在,对越轨行为进行赎罪的主体不再是越轨者个人,而变成了外部代理人。^⑧

四、结语

易洛魁人的萨满教与法国天主教相互碰撞的案例,仅仅是殖民时期基督教与印第安人萨满教多种交往关系中的一种。在其具体碰撞过程中,法国殖民者、耶稣会传教士和易洛魁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一方的势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宗教碰撞的深度和广度,也对宗教碰撞的结果产生影响。法国殖民者和易洛魁人相互敌对并偶尔出现关系缓和的局面,决定了耶稣会传教士在易洛魁人中传播基督教是时断时续的。易洛魁人和法国人不甚融洽的关系,以及耶稣会既依赖法国殖民当局、又与其在宗教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关系格局,促使耶稣会在易洛魁人中传教时努力建立基

^{①②③④⑥} David Blanchard,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ky: Catholicism at Kahnawake, 1667 - 1700”, p. 90, 92, 92 - 95, 93 - 98, 95.

^{⑤⑨} William B. Hart, “The kindness of the blessed Virgin: faith, succor, and the cult of Mary among Christian Hurons and Iroquoi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France”, p. 79.

^⑦ 基督教罪恶的救赎,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_views_on_sin. 阅读时间:2017年1月28日

督教归化村,鼓动易洛魁基督徒移居。易洛魁人和耶稣会的关系尽管受到法国殖民者与易洛魁人关系的影响,但是耶稣会传教的热情、易洛魁人首领的政治和外交需求以及印第安人对更强大宗教保护力量的寻求,使得传教士在易洛魁人五部落中还是有所斩获。

就天主教与易洛魁人萨满教的具体碰撞而言,五部落酋长们的外交和政治需求,使他们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基督教传播提供了可能性。17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断断续续的瘟疫和社会文化的混乱,使很多易洛魁人为了寻求更强大宗教保护力量,皈依为基督徒。同时,基督教传教士向萨满发出了神学方面的挑战,并且导致一部分易洛魁人将种种不幸的矛头指向了萨满的巫术,但是传统萨满在不断反思基督教、白人和易洛魁人的关系时,从基督教中寻找原因,认为基督教中的邪恶力量才是易洛魁人人口锐减、社会和文化混乱的根源,从而不仅反对基督教,也反对与基督教相关的一切人和事物。

在卡纳威克,排除了法国白酒商人的干扰和易洛魁人传统宗教势力的阻碍,易洛魁人政治势力仍然很强大,决定了在宗教碰撞中双方在宗教形式上作出妥协。妥协的结果是易洛魁人中形成了“公开忏悔”仪式。不论是从萨满教入迷术的角度还是从基督教“罪恶观”的视角来审视,易洛魁人的“公开忏悔”似乎与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相差甚远,在更大程度上更像是基督教形式下的萨满教入迷术。在当时的政治宗教背景下,“公开忏悔”仪式或许是基督教和易洛魁人萨满教碰撞后结果较为完美的案例。至少当时的传教士倾向于认为这是易洛魁人虔诚信仰的行为,易洛魁人则通过这种宗教形式满足了对传统宗教的需求。

Abstract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ristianity encountered with Iroquois Shamanism when the Jesuit started their missionary work in the “Five Nations” of Iroquois Confederacy through their program to systematically and selectively convert the Iroquois.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ench colonists and the Iroquois, Christian missionary work in the “Five Nations” was always intermittent. Iroquois leaders, tribes men and Shamans all responded to Christianity and to its missionaries in different way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Iroquois Indian’s traditional political forces, Christianity and Shamanism in Kahnawake made compromises with each other in certain aspects, which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hotouongannandi”, encompassing elements from both Christianity and Shamanism.

(乔国存,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责任编辑:于红]